

※書目文獻※

廣陵新版《通志堂經解》指瑕

駱瑞鶴*

《通志堂經解》（以下簡稱《經解》），題納蘭成德輯，收書一百四十種（舉成數，見《經解》卷首成德原序），主要是宋、元、明三代學者解釋儒家經典之作。是書編成後，終有清一代，版本有三：一是康熙本，是為通志堂原刻；二是乾隆重刊本；三是同治重刊乾隆本。乾隆本筆者未見。三本之後，似無再刊刻者。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有若干影印本面世，如臺灣大通書局之四十冊本，漢京文化公司之四十冊本，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之四十冊本，江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之十六冊本。臺灣本、京都本亦筆者所未見。本文所稱廣陵新版，即指廣陵古籍刻印社本，印行於一九九三年，今以下行文即稱「廣陵新版」、「新版」或「廣陵本」。廣陵本為縮小影印本，故全套只十六冊，精裝十六開。此本卷首有一前言，主要明《經解》之編纂、《經解》之內容及當時重新出版之緣起，但未標明所據為何本。其〈前言〉有云：

宋明理學是學術界討論的重點之一，雖然已有一些出色論著面世，仍大有深加開拓探索的餘地。《通志堂經解》絕版已久，重印以廣流傳，對於治學術史者更廣泛、深入地把握宋元及明代經學的全貌，科學地論定宋學的成就與不足，認清它在學術史以至整個文化史上應有的地位，應當說是很有益處的。

這段論述，強調了重印《經解》的意義，而未作重印所據之版本說明，其上文亦無相關交待。

今以廣陵新版比照康熙本、同治重刊乾隆本（以下稱同治本），有五點比較明確。其一是卷首內容，康熙本卷首內容，首為徐乾學序，次為成德序，次為「新刊

* 駱瑞鶴，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。

經解目錄」；同治本卷首，首為乾隆五十年上諭，次為「重刊《通志堂經解》銜名」，次為成德序，次為徐乾學序，次為兩廣總督瑞麟序。廣陵新版卷首內容與次序跟同治本合。其二是每行字數。一般而言，康熙本每半葉十行，行十九字；同治本每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字。廣陵新版每行亦二十字，與同治本合。其三是字體。康熙、同治兩本字體皆仿宋，但康熙本字體稜角較分明，仍存明刻主要風格，而同治本則圓潤、雋秀得多。廣陵新版字體風格與同治本合。其四是作序者。廣陵新版有兩廣總督瑞麟之序。考《清史稿》卷三八八〈瑞麟傳〉：「瑞麟，字澄泉。……同治元年，出為熱河都統。……二年，調廣州將軍。四年，兼署兩廣總督。……五年，實授兩廣總督。……十年，復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十三年，卒。」是瑞麟官兩廣總督，皆在同治時。其五是編刊者署名。廣陵新版，於某書某卷之末，多有編刊者之名，署云「後學成德校訂，巴陵鍾謙鈞重刊」（第一冊頁一五一上欄張浚《紫巖居士易傳》卷四之末誤書為「巴鍾謙鈞重刊」）。今檢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七〈鍾謙鈞傳〉：「鍾謙鈞，湖南巴陵人。……同治元年，補漢陽府知府。……八年，擢廣東鹽運使。……十一年，署按察使，以捐直隸賑，加二品頂戴。……十二年，因病乞休。十三年，卒。」此鍾謙鈞當即重刊《經解》者。合以上五事，則知廣陵新版所據之本乃同治本。今細計頁、欄，更知廣陵新版是將同治本之四葉半縮印合併為一頁，即廣陵新版每頁含同治本之九個半葉，並隔為上、中、下三欄。這裏費時推測廣陵新版所據之本為同治刻本，是便於以下討論時作些比較。

廣陵新版《通志堂經解》的印行，為有關我國傳統學術的研究作出了貢獻，而且這種貢獻仍在持續，這裏不論。以下要指出的是廣陵新版的瑕疵或不足，以提醒讀者，並以便將來重印時參考。

廣陵新版的瑕疵或不足，主要有兩方面：第一是文字縮印過小。縮印過小，則一些原刻小字注文，其字大小僅如粟米，而且模糊不清，不可識讀，有損於縮印的實用價值。第二是拼版的錯誤。如果說小字縮印是受到經濟成本條件等的客觀限制，那麼拼版錯誤則是人為造成的。下面要討論的，即是拼版錯誤之例。

第六冊，王天與、彭應龍《尚書纂傳》之卷首，在成德〈梅浦王氏天與《尚書纂傳》序〉、彭應龍序、劉辰翁序、劉坦序、王天與自序、王振題辭之後，其二九九頁中、下欄有崔君舉文一篇。君舉之文略云：

六經惟《書》最難讀。去古既遠，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胷，往往以其褊且

薄者，揣臆其寬大忠厚，故非惟文義少通，句讀亦未易曉。自韓昌黎已目盤詰以聾牙；近代大儒朱晦菴，白首明經，獨不為是完書，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。惟場屋之士，決得失于一。……科舉廢亦久矣，士無繫累，蕩然失其所挾。向時號為舉子進士，今試使口誦本經，不能以句，此宜駸駸返乎醇朴。惟吾友梅浦王君，搜遠尋墜，辛苦纂《書傳》，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，無復遺憾，首尾十餘年而後就。……余平生不泥傳註，隨所蘊輒言，竭所言輒止；講貫該洽，以是媿君。因君《書傳》成，而俛仰悲欣於得喪之表，竊獨以為是宜家藏而人誦之也。為述其梗槩，寘之卷末。戊子長至日，友人崔君舉謹書。

今在不影響敘述的前提下，錄原文或有省略。君舉此文，廣陵新版於元董鼎《書集傳輯錄纂注》之卷首重複出現，列於董鼎所錄《書集傳》蔡沈原序與董鼎自序之間。其文亦在新版第六冊，見該冊第三八二頁中、下欄。今按崔氏此文云：「惟吾友梅浦王君，搜遠尋墜，辛苦纂《書傳》。」「梅浦」當是「王君」之號，而「王君」即王天與。《四庫提要》卷十二「《尚書纂傳》四十六卷」條下謂天與為「梅浦人」，以「梅浦」為地名，恐不然；當從《續文獻通考》卷一四六，「梅浦」為天與之號。天與字立大（見彭應龍序、劉坦序）；其自序署云：「戊子仲春，吉之安成後學王天與謹識。」其子王振題辭又有云：「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儒學教授。」則其人為江西安成（漢稱安成，今為安福）人。所謂「《書傳》」，即天與《尚書纂傳》，而非蔡沈《書集傳》或董鼎《書集傳輯錄纂注》。董鼎書卷首復有此文，顯為誤置。檢同治本第三十八函、康熙本第二十八函，董鼎書亦皆不附君舉此文。君舉文又云：「為述其梗槩，寘之卷末。」則其文乃《尚書纂傳》卷末之跋文或後序，而非卷首序文。古書之跋文或後序，後人重新刊刻時雖有置於卷首者，但君舉此文，依影印原刊本，則當置於卷末，今在卷首，亦為誤置。考同治原刻第三十七函第三十九冊，君舉此文正在《尚書纂傳》卷末，其書口刻有「尚書纂後序」五字。上溯至康熙本，亦與同治本同。

第七冊第三十二頁上、中欄，元人陳櫟《書集傳纂疏》卷首，蔡沈〈書集傳序〉與陳櫟之自序被混淆排列。茲依原式錄於次：

〈書集傳序〉

慶元己未冬，先生文公令沈作《書集傳》。明年，先生歿。又十年，始克成編，總若干萬言。……《集傳》本先生所命，故凡引用師說，不復識別。四

代之書，分爲六卷。文以時異，治以道同。聖人（以上上欄第一行至第二十二行）

《書》載帝王之治，而治本於道，道本於心。……（櫟）（鶴按：陳櫟自謂，原書以小字）不揆晚學，三十年前，時科舉未興，嘗編《書解折衷》，將以羽翼蔡傳。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，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。遂加博采精究，方克成編。今謀板行，幸遇古邢張子禹，命工刊刻，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。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，後學新安陳櫟謹書。（以上上欄第二十三行至三十三行、中欄第一行至第五行）

之心見於《書》，猶化工之妙；著於物，非精深不能識也。是傳也，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心，雖未必能造其微；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書，因是訓詁，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。嘉定己巳三月既望，武夷蔡沈序。（以上中欄，第十二行至第十五行）

以上所錄，「陳櫟謹書」行與「之心」行之間有六行空白。此所錄只有一題，即〈書集傳序〉，實則為兩篇文章。自「慶元己未冬」至「聖人」，又自「之心見於《書》」至「武夷蔡沈序」，為蔡沈〈書集傳序〉之文，「聖人之心見於《書》」七字連讀。中間低一格者為陳櫟〈書集傳纂疏自序〉之文。陳序夾於蔡序之間，幸低一格，可以直觀明辨，但就編輯《通志堂經解》而言則謬甚。以拼版之事而論，蔡沈序前大半居上欄，占二十二行，合同治原刻一葉。因新版每頁每欄合原刻一葉半，則上欄所餘十一行，當緊接「之心見於《書》」以下七十九字，今乃插入陳櫟自序，令人不解。檢同治原刻第四十一函第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三冊，為陳櫟《書集傳纂疏》。第五十三冊卷首內容依次為蔡沈〈書集傳序〉、〈書蔡氏傳纂疏凡例〉、陳櫟自序。新版既然將蔡序、陳序錯綜而置於第一、二欄，其凡例只得置於第三欄，如此，其順序則為蔡沈〈書集傳序〉、陳櫟自序、蔡沈〈書集傳序〉、〈書蔡氏傳纂疏凡例〉，跟原刻大相徑庭，並與「重印」原則不合。

第七冊第五五〇頁上欄為成德〈王魯齋《詩疑》序〉一首，同頁中、下欄至五五一頁上欄則為張耒《詩說》；第五五一頁中欄，為成德跋張耒《詩說》之文，下欄乃為王栢（王魯齋）《詩疑》第一卷。如此安排，所繫序、跋皆不當。

檢同治原刻第四十七函第十九冊，其內容依次為成德跋張耒《詩說》之文、《詩說》正文、成德〈王魯齋《詩疑》序〉、王栢《詩疑》，版面秩然不亂。廣陵新版將成德〈王魯齋《詩疑》序〉冠於張耒《詩說》之上，實為錯誤。康熙原刻本

第三十五函第一冊，成德之〈王魯齋《詩疑》序〉亦在王栢《詩疑》之前，與同治本同。王栢《詩疑》與張耒《詩說》無涉，恐是新版編輯時誤此兩書為一書，故拼排序、跋錯亂。又，成德跋張耒《詩說》之文，同治本在張耒《詩說》之前，康熙本則在《詩說》之後，新版同康熙本。新版所據原本既為同治本，則當從同治本，今反與康熙本同，則又是偶然相合，並非有意從康熙本。康熙本於張耒《詩說》及成德之跋文、於王栢《詩疑》及成德之序文，皆分別明白，各自相從。新版則先誤成德〈王魯齋《詩疑》序〉為序張耒《詩說》之文，故冠於《詩說》之上；復誤成德跋《詩說》之文為序《詩疑》之文，故冠於《詩疑》之上，實非繫於《詩說》之末，細觀新版版面，其義顯然。

第八冊第二三三頁上、中欄有成德〈朱孟章《詩疑問》序〉一首，略云：

〈朱孟章《詩疑問》序〉

《詩疑問》七卷，元進士朱倬孟章著。朱氏《授經圖》、焦氏《經籍志》皆作六卷。今本七卷，末附南昌趙惠《詩辨說》一卷。……哀辭言：壬辰秋，寇由開化趨遂安，吏卒逃散，倬大《詩經疑問》，朱君孟章所擬，以□淑人者也。朱君以明經取□□凡所辨難，誠足以發朱子之□而無高叟之固。然其間□□□無荅者，豈真以為疑哉，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。舊□□□先後無緒，今特為之論□□□使旨同而辭小異者，因得以互觀焉。……昔至正丁亥蒲節，建安書林劉錦文叔簡因書以識卷末云。（以上上欄）

書於座，有「生為元臣，死為元鬼」語，遂坐公所以待盡。……嗟，嗟！倬以義烈著，德以高隱稱，雖無經學，皆可表見，況著述章章若是乎！是不可以無傳也已。

康熙丙辰，納蘭成德容若序。（以上中欄）

初讀其文，難以索解；細加審核，方知為兩文的錯誤拼合。兩篇文章，其一為成德自作〈朱孟章《詩疑問》序〉；其一為元代劉錦文編刊朱倬《詩經疑問》時所作之跋。此所錄之上欄文字，自「《詩疑問》七卷」至「倬大」，以及中欄全部，為成德序文，凡七百八十九字；上欄至中欄「倬大書於座」五字當連讀，為一句，上欄自「《詩經疑問》」至「因書以識卷末云」為劉錦文跋，原文一百五十七字，今闕其十三字。檢同治原刻第五十一函第三十三冊，元朱倬《詩經疑問》卷首即為劉錦文跋與成德序，錦文跋在前而成德序居後，極分明；廣陵新版混排兩文，顯然錯誤。新版若忠於原刻，除當分別兩文之外，兩文先後次序亦當調整。又，劉錦文跋

所闕之字，讀者可以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所載為參考，今試錄其有關文字，亦以明廣陵新版之誤。《四部備要》本《經義考》卷一一一〈詩（十四）〉：「朱氏（倬）《詩疑問》，七卷，存。劉錦文跋曰：『《詩經疑問》，朱君孟章所擬，以淑人者也。朱君以明經取科第。凡所辨難，誠足以發朱子之蘊，而無高叟之固。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，豈真以為疑哉，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。舊本先後無緒，今特為之論定，使旨同而辭小異者，因得以互觀焉。』」其下又載成德序曰，今以文繁不錄，但已足以明廣陵新版之誤。其《經解》之闕文，「以淑人者也」，《經義考》「淑」字下無闕。

廣陵新版致誤的原因，推測起來，約有兩端：一是技術上的，一是識見上的。技術上的原因，如成像之後，拼版之前，編號錯亂，失於複查。識見上的原因，如拼版之時，未細讀原文，只看書題、篇題而已，而看書題、篇題亦粗略。《通志堂經解》中，除成德所作序跋外，宋元人序跋，一般無題目，拼版時既離開了原刻，又不細讀其文，則彼此混淆或張冠李戴的現象必然發生。這兩方面原因導致的錯誤，若拼版時及付印之前再與所用原刻詳加對照一過，都可以避免。所用原刻，或有處理不當之處，新版仍之，咎不在新版。如元人程端學有「《春秋》三書」，成德只見其《春秋本義》和《春秋或問》，而《三傳辨疑》缺佚。《通志堂經解》收入前二種，但成德仍為程氏「《春秋》三書」作一總序，題「程積齋春秋序」。同治本、康熙本皆將《本義》置於前，將《或問》置於後，而成德總序乃繫於在後之《或問》，並不妥當。廣陵新版仍同治本之舊，是與原刻相合，無可非議。更有原著如此而不可更改者，如宋新安胡方平著《易學啟蒙通釋》二卷，其自序亡，成德乃以朱熹《易學啟蒙》之自序為方平之序（熹序先見於朱鑑《文公易說》卷二十二），置於《通釋》卷首，廣陵新版依舊拼印，亦無可非議。